



叙事的转向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



彭 刚 著

The Narrative Tur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叙事的转向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

彭 刚 著

The Narrative Tur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彭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301-15859-3

I. 叙… II. 彭… III. 史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20 世纪
IV. K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1213 号

书 名: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

著作责任者:彭 刚 著

责任编辑:岳秀坤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859-3/K · 063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4.5 印张 197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一

何兆武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一词，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指过去所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思想和活动，二是它同时也指我们自己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这里便有两种不同层次和不同内涵的对象。但是人们却往往习焉而不察，把这二者等同为一，混为一谈，由此便产生了许多理解上和思想上的混乱。

我们通常说的一部中国史如何如何，这可以是指过去发生过或出现过的事件和思想都是些什么，但也可以是指某些文献或证据表明过去发生过或出现过什么事件和思想。这二者本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对象，却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而不加以区别。一部中国史，可以是指中国过去的历史发生过什么事实，但也可以是指有关中国历史的资料向我们表明了某种意义。虽然两者都被简单地称之为历史，但两者的内涵却不相同，各有其不同的诉求和祈向。一种是指事实上都发生了什么，一种是人们是如何在理解或解说这些事件的。既然历史事件无法重演，我们就只能是在事后进行间接的推论。因此这些论断就都是事后的推导，而不是直接的断论。所谓意义，并不是史实直接给定的，而是读史者事后推论得出的。一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实，一种是事后人们是

II 叙事的转向

怎样理解的。史实只是数据,历史学家的职业则是要把数据总结为一个公式。数据可以是给定的,但所总结出来的公式则是人为的。而我们既不可能直接参与历史事件,便只好是局限于转手所得之于史料的素材,再加以自己的思想制作。我们既然不可能直接参与历史事变,便只能根据历史学家是怎样表述的而再重新述说历史。过去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对于其间的区别往往习焉而不察,从而引致了思想和认识上的混乱。甚至于连孟子都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嫌。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总是有限的、片面的,所以总会有其主观上的局限性,所以不可能是真正“客观的”。大家即使一致认同的,也并不就等于客观。雨后的天空会出现彩虹,它是人所共见的,但彩虹是客观存在的吗?每个时代、每个群体、每个个人都会有其局限性或偏见,因此,传统史学家所谓的那种意义上的“客观如实”,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但习惯势力却总是在引导人们倾向于认为被大多数人习惯上所认同的就是客观的事实,例如说秦始皇是暴君、曹操是奸雄之类。尽管人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真相的全貌,但又相信人们终究是在日愈接近于所谓历史的真相。

什么是所谓“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的领域,这个问题的提出和19世纪末叶自然科学观的大变革是同步的。17世纪牛顿的经典体系仿佛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物质世界运动的奥秘,以至于诗人蒲伯称赞他说:“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便都大白于天下。”19世纪的达尔文,似乎对于生物世界也同样地发现了它的大经大法。但是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是最后的定案,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在进步的。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人们的思想和认识总是不断在演进的,对于所谓“历史的真实”的看法也不例外。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各门学科的进步,历史学的领域也更深入地在考虑“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过去长期被奉为圭臬的所谓“客观如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这一信条也就随之动摇了。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史料学。史料是一堆砖瓦建

材,但是要建筑历史学上的大厦,却有赖于乃至取决于历史学家所精心勾绘的那张蓝图。尤其是到了20世纪,随着传统的史学思想信念的倾塌,各种新观念和新理论竞相争奇斗妍,使人目不暇给。史学理论这个领域也就从过去那种附庸地位冉冉升起,蔚为一门显学。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特殊学科,既要求有其严谨的纪律来规范,但同时又是充满了个性创造力的一门艺术。它要求个性的创造力并不亚于它之要求严谨的科学性。它既要求严格的纪律规范,又要求富有天才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力,亦即它既要求自然科学那种严谨的献身精神,又复要求有艺术家的那种灵心善感。

本书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当代史学理论名家的各种学说。本书不但对当代西方史学名家如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昆廷·斯金纳等人的理论有深入的探讨,而且同时能抒发己见,每每探骊得珠,为我国的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认识论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我国史学界深入一步地进行一番理论上自我批判的洗礼。任何学科的进步都必定要伴随着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没有不断的自我批判,也就没有进步可言。

如果要问:历史学是科学吗?19世纪史学界代表人物伯里(J. B. Bury)的答复是:“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但是当代史学家的答复很可能是:“历史学是科学,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它比科学多了点什么(例如,它要求灵心善感),又少了点什么(例如,它不可能重复进行同一个实验)”。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我们对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才有可能对于所谓历史得到一番更为深切著明的理解。

2009年6月于清华大学

序 二

刘家和

月初，友人彭刚君来，带来他的大著《叙事的转向》书稿，告以行将付梓，并嘱为之作序。初听之后，颇觉惶恐，内心自问：我的学力胜任吗？这倒不是故作谦辞，实在因为彭君在此方面本属科班出身，其译著与论文问世者已经不少，而且颇得学界好评，我自己也认为他已经是一位相当出色的青年专家；而我作为一个长期以具体史学为工作对象的学者，虽然对于史学理论一直深怀业余爱好（也许还可以说这种 hobby 也到了某种 crazy 的程度），但是充其量不过一介“下海票友”而已。要我给他的书写序，能写出什么模样来呢？总不能“佛头着粪”吧。于是建议彭君，宜请何兆武先生作序。何先生既为彭君之师，又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之巨擘，为彭君此书作序，其谁能谓不宜？彭君答称，已请序于何先生，并蒙俯允；并说在此书后记中已经提到将请何先生与不才作序，且戏言“大概脱不了‘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听完此语，我不禁失笑说：“何先生为足下之本师，足下即成长于何先生学术之旗下，此大旗不拉已有，无须再拉；而我算得上什么大旗？人家不说我为你的书写序是附君骥尾，那已经够宽大为怀的了，何来足下所谓

之嫌疑?”于是,彭君与我相视而笑。此时我心亦豁然有所悟,什么“大旗”、“虎皮”、“附骥”、“沾光”之类,一概无非“客气”(非今日通常所用的意思)之浮词,原无关于学术交往之实际,一笑置之,就可以了。鉴于彭君与我这些年来的学术交往,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的确是相当不错的,为朋友的书写一篇序,不论好坏,也总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交往、对话,对于读者多少是会有些好处的。于是我们商定,何先生作为老师的序作为序一,我作为朋友的序作为序二。这样开始准备写序了。

要为他的书写序,就不能不读其书。不过,正如彭君所言,他的书中的多数内容不是成文以前就和我有所讨论,就是成文后首先让我先睹为快,随后还会有些交谈和讨论,所以看起来相当熟悉,颇有如见故人之感。这里就要谈一点彭君与我的学术交往。我对史学理论长期有浓烈之兴趣,抓到一点时间都会读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或译作,而我自己限于时间之紧张以及精力之不足,读遍外国书之中文译本都来不及,读了一些感到译文有难解之处的书,想到各图书馆查找原文书也有力所不逮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彭刚君的译文颇能承乃师何先生之风,让我读起来方便易解并且比较放心;有其他译著要对读原文者,他又会帮我找来原书或复印本。所以,他是我研读外国当代史学理论的一位益友。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方便,我读后有想法自然也会和他交流。在交流中,他常给我带来许多新的信息以及他的看法,我会就此提出愚见,有时还会结合中国传统文史之学谈一些个人见解。我们之间年龄差异虽大,但是彼此皆能尽兴而谈,竟然常在讨论中得到一种互相推敲和印证的愉悦。这样我们之间就构成了学术上的忘年之交。这也说明,他之所以要我写序,不过是平时学术交流的一种继续而已。当然,这样的序,只能是朋友的序。

以上谈了在与我交往之中的彭君其人,现在该谈谈其书了。在准备写序中与彭君通话数次,就书中内容可分析、可扩展讨论之点也做了不少的交流,而且颇有相得益彰之处。原来准备把这些内容初步写进序文里。可是经过对目前不得不做的种种事情的安排,发现我暂时实

VI 叙事的转向

在做不到这样一点。所以下面只能对此书的内容重点就我所见及者做些简要的介绍。

在我看来,彭君此书乃是一部关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专著,而其重点则在于史学理论发展之历史。不过,他的叙述方式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严格地依照编年式的编排,而是有重点地突出当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然后再把它们置于史学理论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论述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彭君此书的书名已经切中鹄的地指认出来——叙事的转向。当然在叙事的转向(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与史学中的叙事转向是一致的)中出现的流派并不止一家,他没有太多着墨于从理论上反对“总体史”而在实践上致力于一村、一镇的细化叙事的史学的论述,而是特别聚焦于史学叙事转向中的两位在理论上起到了领军作用的人物——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同时也论及在思想史研究中深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人语言哲学影响的昆廷·斯金纳。本书的开始三个部分就是对这三位学者所做的个案的论述。有了这三个主要的个案的论述以后,接着就是其第四部分,即从个案到以19世纪为缘起的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自历史事实与解释的关系的角度把这一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粗略地说,在重构论(按,以兰克为代表)看来,事实的积累自会呈现出意义和模式,历史解释出自历史事实;在建构论(按,以克罗齐、柯林武德为代表)看来,事实并非解释所要围绕的‘硬核’,事实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工作程序,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在其中,而解释的结构符合于事实的结构,乃是解释成功的标准;在解构论(按,即语言学的转向或叙事的转向,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为代表)看来,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互相转换。”(见本书第151页)彭君在论述的同时,分析了其间的过渡的内在理路与历史意义,并且在必要的地方也给出了自己批评性的意见。既然已经讨论了历史的事实与解释的关系,在随后的第五部分中,他自然

地把讨论聚焦到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历史学的客观性,乃是专业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核心之点。人们通常以为,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已经对于历史的客观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而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则完全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不论是海登·怀特,还是安克斯密特,都没有否认个别历史事件的实在性。但是,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做历史叙事时可以任意选用一种隐喻框架来先验地规划其叙事总体,如此一来,还能给历史的客观性保留多少余地呢?而安克斯密特又进一步区分了“历史表现”(或“叙事实体”)和“历史描述”(或“历史陈述”),如果说“历史描述”还“指涉”(to refer to)实在,那么“历史表现”就只是“关于”(to be about)实在而已。这样,作为文本的历史与客观性的关系,就如同风筝断了线,结果就不知所终了。彭君对于这些理论都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分析与批评。既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对我们有其拓展视野的作用,又能作出切实的批评,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作用的。我的这一段文字,就是对于彭君此书五部分的大体框架的介绍。是否准确?则有待于彭君及读者诸君的指教。

彭君此书的两篇附录也是颇值一读的。由于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史学理论与沃尔什的视角(或配景、透视)理论(即相对主义理论)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此书附录一“后现代视野下的沃尔什”,即对沃尔什的视角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异同做了很有趣味的辨析。附录二“‘母鸡’的气象与‘鸡蛋’的品质之间”,是一篇锋利而幽默的史学理论杂文,文锋直指的是某位学者的学术气象与风度,而其深处实在指向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与作者绝缘的思想。读其书,竟然可以不知其人!如果说文本所展现的是作者的灵魂,那么作者就是文本灵魂所赖以托生的机体。离开机体看灵魂,那么不是无从追寻幽灵之所在就是活见鬼。

还有一点似乎值得一说,那就是,许多专业历史学家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作品,就会觉得其内容很难理解。其间的障碍,固然有其

VIII 叙事的转向

概念与思路悬殊的原因,不过也有译介者所用语言未能尽合中国读者习惯的缘故。在我看来,彭君的译介与研究总体来说是清晰易解的。这也甚便于读者。

这篇序文,至此为止。尚祈彭君与读者诸君批评指教。

2009年6月2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之寓庐愚厂

目 录

序 一 何兆武/I

序 二 刘家和/IV

第一章 海登·怀特:叙事、虚构与历史/1

第二章 安克斯密特: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42

第三章 昆廷·斯金纳:历史地理解思想/80

第四章 史料、事实与解释: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
视野下的考察/116

第五章 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157

附 录

一 后现代视野之下的沃尔什/191

二 在“母鸡”的气象与“鸡蛋”的品质之间/200

引用文献/204

索 引/212

后 记/219

第一章 海登·怀特： 叙事、虚构与历史

—

20 世纪之初，西方历史哲学的领域中发生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型。按沃尔什广为人知的概括，前者指的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它所要探询的是客观历史过程的目标、意义、规律、动力等问题；后者则是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特性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探讨。^① 我们也可以更加浅白地将二者之间的分野，视作是二者分别以“历史”和“史学”作为自己理论反思的对象。分析的历史哲学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前，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

① 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参见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载其《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主流,在对历史解释的特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等问题的探索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某一种理论范式之下对该领域的理论探讨,往往会因为该范式所提供的核心问题在一定阶段内可被深入的程度、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的各种可能性被大量消耗之后而陷入僵局。这正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迅速发展之后所面临的局面。而此时历史哲学领域内再次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此种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又有人称之为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或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使得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浮出水面,取代分析的历史哲学而成为当代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使得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在危机中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则是促成这一转型的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在其主要著作《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①和一系列论著中所提出的基本思路 and 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近几十年来西方(尤其是英美)历史哲学的理论取向和思考重心。

叙事(narrative)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往往被等同为“讲故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内之所以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生叙事的转向,有其多方面的动因。首先,就历史学实践而言,历史学彰明较著的学科特点之一就是,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各部门社会科学,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性术语,它是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作为传达自身研究成

①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中译本为《元史学: 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根据的是英文原本。

果的基本工具,而叙事一直以来就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甚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史学话语的根本属性。由克罗齐著名的“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①的论断,足见“讲故事”(story-telling)的特性作为历史学著作根本特征之深入人心。但是,二战以来,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西方历史学的形态。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纷纷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长时段的社会、经济、人口的变迁成为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所致力研究的主题。叙事作为前社会科学、前分析的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痕迹而遭到质疑和排斥。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罗代尔就曾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于传统的叙事史学的轻蔑:

在叙事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人们的生活是被戏剧性的偶然事变所支配,是被那些偶然出现、作为他们自身命运而尤其是我们命运的主人的出类拔萃的人们所主宰着的。并且,当他们谈起“普遍史”时,他们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些出类拔萃的命运的纵横交错,因为很显然,每一位英雄都需要另外一位来搭配。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欺瞒人的伎俩。^②

与以问题为导向、对于长时段的非人为(impersonal)进程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分析相比,叙事史学已经显得落伍了。从叙事史学到问题导向的分析性的历史研究的转型,在很多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推动者和

① 转引自海登·怀特:《形式之内容》(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4页。

② 布罗代尔:《论历史》(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Sarah Matthews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第11页。

倡导者看来,乃是历史学进步的唯一路径。^①然而,叙事史学并没有随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而衰微或者竟至于销声匿迹。一方面,许多职业史学家顽强地捍卫着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不断有叙事性的历史著作被生产出来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叙事模式在一度遭到贬抑之后,开始展示出来它所特有的魅力,甚至于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化史学阵营内的史家,也开始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来解释历史和组织他们的历史著作。比如,原本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在人口史和社会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年鉴学派的重要成员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了他的名著《蒙塔尤》^②,此书以叙事的方式对14世纪初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到20世纪70年代末,围绕着《过去与现在》杂志的英国史学社会科学化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劳伦斯·斯通和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都已经在谈论“叙事的复兴”了。^③历史学实践已经在呼唤着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论反思。

其次,从理论逻辑来说,叙事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所强调的分析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得到重新审视。围绕着历史解释的各种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原本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议题。亨佩尔等人的覆盖律

① 年鉴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而著称的孚雷(Francois Furet)的一篇理论纲领性的论文,就题名为“从叙事史学到问题导向的史学”(“From Narrative History to Problem-Oriented History”),载杰弗里·罗伯茨编《历史与叙事读本》(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② 该书中文本为《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③ 见劳伦斯·斯通“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in 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和霍布斯鲍姆“叙事的复兴:一些评论”(Eric Hobsbawm,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Some Comments”, in 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covering law) 模式强调,一切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藉由被纳入一个普遍规律之下而得到解释的;而德雷等人的合理行动(rational action)模式则秉承柯林武德的思路,认为了解和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才是理解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随着讨论的深入,历史叙事所具有的解释功能开始得到人们的注意,历史学的叙事特质进入了历史哲学理论反思的前沿地带。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历史事件被纳入某个叙事性的话语结构,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与其他事件、并且与某个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它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解释。这一论点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至少在优秀的历史作品中)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怀特就此引述文化史名家盖伊的话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而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则是欠缺的”,并用康德式的语言将这句话改写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①

再次,从历史哲学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在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的研究已明显呈现出回报递减的情形下,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不再以历史解释的模式等问题作为自身关注的重心,而是将着眼点转移到历史研究的成果体现亦即历史叙事的文本上,从而获得了一系列崭新的视角和洞见。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相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客观的历史过程而言,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以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作为自己理论反思的主要对象的。前者可说是在后者的基础上革新、深化和推进了对历史学的理论反思。

如果我们把史学反思关注的焦点放在历史研究的最终产品——历史著作——之上,就可以发现,历史著作最显明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②,它乃是

①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4. 康德认识论的命题是说“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

②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